

# 凯恩斯革命：一个论争史的考察

任维伟 李黎力

【摘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经济学产生的深远影响通常被描述为“凯恩斯革命”。然而，就凯恩斯是否引发经济学的革命，学界一直存在争论。认为凯恩斯革命成立的经济学家通常从理论、政策、方法论和知识社会学四个维度展开论证。他们认为凯恩斯在否定正统的古典经济学，重构新的经济理论体系，破除自由放任的政策神话，引领政府干预成为常规的政策实践等方面带有强烈的革命色彩，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思考世界的方式。否定凯恩斯革命成立的经济学家则主要致力于从理论和政策两个维度解构“革命”。他们指出，凯恩斯的新经济学中所谓革命性的理论成分和激进的政策处方在《通论》之前早已存在，而且经济学史连续性和政策制定的渐进性意味着“革命”之说是一种虚构的神话。该论争背后不仅表明经济学“革命”框架的缺失和分析的滞后，也能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凯恩斯革命；理论革命；政策革命；“修正主义”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5)02-0101-13

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倾向于强化一种特殊的经济学演化模式，即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学危机，进而引致经济学革命。一般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引发了“凯恩斯革命”（Keynesian Revolution），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带来了“卢卡斯革命”（Lucasian Revolution）。这种历史经验很容易让人们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又期待一场颠覆性的经济学革命。然而，十多年过去了，“革命”并未发生，这门学科依旧如故，尽管它在危机之初确实经历过预示着革命前兆的知识反思热潮。这提醒我们，可能需要修正上述这种惯常的经济学演化模式。特别是，由于“凯恩斯革命”通常被认为是我们学科中唯一真正的“革命”，如果这场“革命”可能是言过其实的，或其性质仍有待澄清，那么期待新的经济学革命随金融危机而至，似乎也就没有可信的历史依据了。

遗憾的是，经济学家虽时常论及“凯恩斯革命”，却很少热衷于阐明这场革命的性质。一般的经济学文献并不会深究“凯恩斯革命”这一术语背后的历史内涵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争议，而教科书在概述宏观经济学的历史时，出于展示共识的目的，往往也不会触及经济学家曾就“凯恩斯革命”进行的激烈争论。虽然经济思想史家关于“凯恩斯革命”的历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缺陷，但他们主要专注于“革命”的理论贡献和政策影响，并往往将“凯恩斯革命”泛化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对凯

【作者简介】任维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黎力，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87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经济思想编史学研究”（23BJL017）

恩斯贡献的解读”，超越了“革命”本身。<sup>①</sup>

鉴于文献中这种术语使用的方式，本文聚焦于“‘凯恩斯革命’是否名副其实”的论争史，考察经济学家在历史上如何就“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是否带来一场经济学革命”展开论争。以“革命”为基点的历史检视不仅有助于理解“凯恩斯革命”的历史内涵，重新反思经济学的演化模式，在基础理论层面更好地助力经济思想编史学研究<sup>②</sup>，而且还可以以此为观照，推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 一、论争的历史脉络

“凯恩斯革命”这一术语的引入和普及归功于克莱因（Lawrence Klein）1947年出版的著作《凯恩斯革命》（*The Keynesian Revolution*）。此前，即《通论》问世后的十多年间，经济学家是在“新经济学”（New Economics）的标签下就凯恩斯思想的革命性展开争论的。事后来看，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识别出了“凯恩斯革命”的两个主要维度：经济理论的革命和经济政策（或政府管理）的革命。<sup>③</sup>“革命”的两个方面相互交织，但进展速度不一。经济理论的“凯恩斯革命”贯穿论争的始终，争论的两次高潮分别发生在《通论》出版之后的十年间和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与之相反，政策领域的“凯恩斯革命”则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被提上日程，成为关注的焦点。

最初的论争由凯恩斯本人在理论层面挑起，他多次强调自己理论的革命性。早在1935年元旦，凯恩斯就写信给萧伯纳（Bernard Shaw）称，自己正在撰写一本将在未来十年内“革命性地改变世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的经济理论著作”。<sup>④</sup>一年后，这部著作以《通论》为名出版，它被凯恩斯描述为逃避惯常的正统经济学思维而长期挣扎逃离的产物。在《通论》中，凯恩斯将古典经济学家比作“非欧式世界中的欧式几何学家”，并以背离英国古典正统的新教徒自居，坚称除了抛弃古典理论，建立一个能够容纳非自愿失业的新理论体系外，别无选择。<sup>⑤</sup>这种与过去彻底决裂的革命精神和挑衅性言辞，几乎在《通论》出版后便立即引发了凯恩斯思想是否具有革命性的激烈争论。由于凯恩斯坚持自己的理论适用于一般通常的情况，而古典经济学只是极端特例，因而，二战前在理论层面就“凯恩斯革命”进行的辩论很快就演变成“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之间的论战，重点转变为识别凯恩斯理论相较于“古典学派”的革命性要素。主要论战双方是被凯恩斯归为“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与愿意挑战权威并接受“新经济学”洗礼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前者断然否认凯恩斯理论的革命性，他们指责凯恩斯虚构了“古典学派”稻草人，夸大自己的贡献；后者热情地肯定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但论及“革命”时措辞谨慎，并在试图将凯恩斯的理论转化为形式模型的过程中，反而削弱了凯恩斯思想的革命性，以至于克劳尔称之为“反革命”。<sup>⑥</sup>与此同时，俄林（Bertil Ohlin）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上撰文阐述了斯德哥尔摩学派与凯恩斯理论之间的异同，由此开启了另一条消解革命的路线，即《通论》之前

① 相关的历史研究参见：Roger E. Backhouse,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Roger E. Backhouse and Bradley W. Bateman,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ey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9–38; Roger E. Backhouse and Bradley W. Bateman, “Whose Keynes?” in Robert W. Dimand, et al., eds., *Keynes’s General Theory After Seventy Years*, London: Macmillan, 2010, pp. 8–27; Roger E. Backhouse and Keith Tribe,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A Course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Newcastle upon Tyne: Agenda Publishing, 2018, pp. 289–301.

② 李黎力、贾根良：《经济思想编史学：学科性质、内容与意义》，《经济学动态》2017年第11期。

③ 刘涤源：《凯恩斯革命的内涵与真谛》，《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陆家骝：《论“凯恩斯革命”的真实底蕴——纪念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60周年》，《经济学家》1996年第5期。克拉克在其著作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考察了凯恩斯的政策革命和理论革命，参见Peter Clarke,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the Making, 1924–193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④ John Maynard Keynes, “From a Letter to George Bernard Shaw, 1 January 1935,” in Donald Moggridge, ed.,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and After, Part I: Preparation*, vol. X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492–493.

⑤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1页。

⑥ Robert W. Clower, “The Keynesian Counter-Revolution: A Theoretical Appraisal,” in Donald A. Walker, ed., *Money and Markets: Essays by Robert W. Cl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34.

的经济学是否“预见”了《通论》，这个问题将在20世纪后半叶卷土重来，成为论争的焦点。

二战的爆发几乎终止了所有的纠缠。经济学在战争期间转变为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建模科学，导致老一辈经济学家在战后被迫退出争论的前沿，年轻一代经济学家开发并沿用至今的IS-LM模型成为解释“凯恩斯与古典学派”的标准方式。尽管克莱因为凯恩斯的“思想革命”提供了一个严谨的思想史辩护<sup>①</sup>，但标准解释却将函数形式和曲线斜率视作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之间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这就为在一个更加一般的框架中调和二者奠定了基础。最终在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和帕廷金（Don Patinkin）等人的努力下，凯恩斯与“古典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复兴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实现了“和解”，并以共识的形式在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入门教科书中以“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 Synthesis）的名义教授给一代又一代的新经济学人。这不仅标志着“凯恩斯革命”的胜利，同时也是对“凯恩斯革命”的驯服。<sup>②</sup>教科书传统虽然巩固了革命成果，开启了新的常规科学阶段，但掩盖了革命背后的激烈争论，以至于在战后大约30年的时间里，人们已不再谈论“凯恩斯革命”。

曾是革命的东西现已成为新的正统，这必然招致战后主流凯恩斯主义阵营之外的其他群体的不满。沙克尔（George Shackle）和莱琼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率先发难，重新提请经济学家正视凯恩斯理论的革命性。激化新一轮辩论的契机是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由于正统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这场经济危机，一时间关于“凯恩斯革命”的争论大规模回潮，并跨越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是一群被称为原教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他们坚称，凯恩斯发动了一场与过去彻底决裂的经济理论革命，强烈反对新古典综合的“冒牌凯恩斯主义”（Bastard Keynesianism）将凯恩斯理论嫁接到一般均衡框架的粗暴做法。在另一个极端，主要是那些声称从未发生过“凯恩斯革命”的经济学家。他们基本秉承经济思想发展和演化的“累积性观点”，试图从思想史脉络中找出《通论》中被视为革命要素的原型，以此否定凯恩斯的革命性。特别是莱德勒极富挑衅性的“虚构凯恩斯革命”论断，直接将论战推向高潮。<sup>③</sup>

相较而言，由于政策既非经济学家所能直接操纵，又具有强烈的国别风格，政策领域就“凯恩斯革命”的论争因而受制于能够获取的政府内部决策信息。因此，《通论》诞生之初学界就凯恩斯政策革命的看法非常纯粹。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政策领域的“凯恩斯革命”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根本无需费心去论证。那时，关于政策革命的标准说法是，《通论》掀起的经济理论革命为凯恩斯主义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主要发达国家在战后普遍转向这一新的干预主义的政策框架。“凯恩斯时代”（Keynesian era）这一荣称大抵便是对凯恩斯的政策革命在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这段时间内取得的全面胜利的最大肯定。对凯恩斯政策革命的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经济学家自己的叙事，他们强调经济思想的力量和专业经济学家在政府决策中的决定性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种政策革命叙事几乎成为一种共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质疑。

然而，就在“滞胀”导致“凯恩斯时代”行将终结之际，质疑政策领域发生过“凯恩斯革命”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异见增多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出现。其一，1967年英国《公共档案法》将公共档案的保密期由50年改为30年，并自1968年起，公共档案局每年年底向社会公布一批期满30年的政府档案；其二，1971年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赞助的30卷本《凯恩斯全集》陆续出版，首次公开了凯恩斯此前未发表的关于经济政策和公共事务的通信。这使得研究人员能够获得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时和战后政府内部有关政策制定的原始材料，再加上新的凯恩斯传记的问

① 参见劳伦斯·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薛蕃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章。

② Kerry A. Pearce and Kevin D. Hoover, “After the Revolution: Paul Samuelson and the Textbook Keynesian Mode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7, no. 5, 1995, pp. 183-216.

③ David Laidler, *Fabricating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Studies of the Inter-war Literature on Money, the Cycle, and Unemploy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经济学家以书评的形式围绕莱德勒的著作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讨论，如 Michel De Vroey, “Book Review,”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7, no. 3, 2000, pp. 443-446; Kevin Hoover, “Book Review,”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23, no. 4, 2001, pp. 541-544; L. E. Johnson and Thomas Cate, “The General Theory: Fabrication or Revolution?”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vol. 30, no. 1, 2002, pp. 87-96; 方福前：《围绕“凯恩斯革命”的最新争论》，《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2期。

世<sup>①</sup>，讨论政策领域的“凯恩斯革命”有了新的基点，反思先前的标准论断变得刻不容缓。

起初，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这段时间里，经济思想史家重新评估了二战前学术经济学家持有的政策观点，以及这期间各国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实际行动。结果是，不仅彻底打破了凯恩斯在“荒野中孤独呐喊”的神话形象——除少数例外（如罗宾斯和奥地利学派），各国大学内外的经济学家在30年代的政策观点与凯恩斯并无二致<sup>②</sup>，而且发现主要国家的官方政策思想更加灵活，很多国家在《通论》之前就产生甚至实行了后来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过，20世纪30年代确实发生的政策转变与凯恩斯的观点之间的关系却始终悬而未决。虽然美德日和瑞典等国有各自独立的可被事后归属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传统<sup>③</sup>，但英国的情况更为复杂，温奇（Donald Winch）等人的政策史研究虽然削弱了凯恩斯政策革命的神话色彩，但还是将30年代的政策转变大部分归功于凯恩斯。

很快，经济史家也对由经济学家撰写的经济理论驱动的政策史表现出不满，风向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转变。一群“修正主义”（revisionist）经济史家利用最新获得的政府档案文件，审慎地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决策部门的政策制定过程。其研究结果不仅否定了20世纪30年代在政策领域发生过“凯恩斯革命”的传统论断，淡化了凯恩斯模型对政府部门的理论影响，而且表明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到战后时期，财政部政策存在强烈的连续性<sup>④</sup>，并将凯恩斯政策革命发生的时间推迟到1945年以后<sup>⑤</sup>，有些甚至走得更远，断言政策领域从未发生过“凯恩斯革命”。<sup>⑥</sup>在政策领域解构革命神话的“修正主义”经济史分析，是对凯恩斯主义全盛时期的早期评论家的研究的有益纠正。然而，“修正主义”的新政策史叙事不仅招致反修正<sup>⑦</sup>，而且其内部就如如何界定政策领域的“凯恩斯革命”和确定革命发生的时间始终莫衷一是<sup>⑧</sup>，以至于到了21世纪，“修正主义”文献达到了一个支离破碎的后现代终点。<sup>⑨</sup>

与此同时，也正是在20世纪后半叶，快速发展的科学知识增长理论为这场论争带来了新秩序，更多的经济思想史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学者加入了辩论队伍。他们借用来自科学哲学的概念，特别是库恩

① 这期间陆续问世的著名传记有：Charles H. Hession, *John Maynard Keynes: A Personal Biography of the Man Who Revolutionized Capitalism and the Way We Live*, London: Macmillan, 1984;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Hopes Betrayed 1883-1920*, London: Macmillan, 1983;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st as Saviour 1920-1937*, London: Macmillan, 1992; D. E. Moggridge, *Maynard Keynes: An Economist's Biograp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② Bernard Corry, "Keyn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Some Reflections," in A. P. Thirlwall, ed., *Keynes and Laissez-Faire*, London: Macmillan, 1978, pp. 3-34.

③ Roger E. Backhouse and Bradley W. Bateman, *Capitalist Revolutionary: John Maynard Keynes*,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6-30.

④ George Peden, *Keynes, The Treasury and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88, pp. 50-55.

⑤ Alan Booth,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Economic Policy-Making,"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6, no. 1, 1983, pp. 103-123.

⑥ Jim Tomlinson, "Why Was There Never a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Economic Policy,"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10, no. 1, 1981, pp. 72-87; Tim Congdon, "Did Britain Have a Keynesian Revolution? Fiscal Policy since 1941," in John Maloney, ed., *Debt and Deficits: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8, pp. 84-115.

⑦ D. E. Moggridge, "From Theory to Policy: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Britain," in Haim Barkai, et al., eds., *Monetary Theory and Thought: Essays in Honour of Don Patinkin*, London: Macmillan, 1993, pp. 109-145.

⑧ 相关争论参见：Jim Tomlinson, "A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Economic Policy-Making?"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7, no. 2, 1984, pp. 258-262; Keith Smith, "Why was There Never a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Economic Policy? A Com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11, no. 2, 1982, pp. 223-228; Alan Booth, "Defining a 'Keynesian Revolutio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7, no. 2, 1984, pp. 263-267; Alan Booth,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Policy-Making: A Repl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8, no. 1, 1985, pp. 101-106; Neil Rollings,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Policy-Making: A Comment,"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8, no. 1, 1985, pp. 95-100; Neil Rollings, "British Budgetary Policy 1945-1954: A 'Keynesian Revolutio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1, no. 2, 1988, pp. 283-298.

⑨ Alan Booth, "New Revisionists and the Keynesian Era in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54, no. 2, 2001, pp. 346-366.

(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从范式转换角度重新审视了凯恩斯革命，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有关“凯恩斯革命是否为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的论争，这直接关涉经济学的演化模式。<sup>①</sup>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帕廷金借用默顿(Robert Merton)的“多重发现”和“优先级”概念，重新考察了斯德哥尔摩学派(以及卡莱茨基)对《通论》的“预见”问题，为这场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复兴的“预见”《通论》之争作出了权威裁决<sup>②</sup>，尽管遭到了克劳尔的反驳。<sup>③</sup>“科学革命”的分析视域不可避免地涉及科学共同体的行为，从而隐含着从知识社会学、文化和语言层面讨论“凯恩斯革命”的可能性，这恰好是约翰逊一直以来坚持的研究进路。<sup>④</sup>

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学发生“应用转向”<sup>⑤</sup>，加之一代又一代年轻的经济学家在掩盖危机和革命精神的教科书传统下成长为学界主力军，“经济学是否有过一场凯恩斯革命”这一历史问题，以及围绕该问题进行的历史论争逐渐淡出了学术经济学家的视野。有关凯恩斯革命的说法纷繁复杂，模糊了辩论的焦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经济学家对该问题的兴趣。本文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尝试赋予这场被遗忘的论争一定的秩序，力图全面呈现赞成与否定“凯恩斯革命”成立的要点。

## 二、“凯恩斯革命”成立论

“凯恩斯革命”的故事通常被经济学家简单地压缩到理论和政策两个维度，他们会谈论凯恩斯的新经济学与古典正统理论的决裂，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国政策实践的根本转变。虽然这抓住了革命的主要成分，但远未穷尽凯恩斯对经济学界和整个社会的革命性影响。我们至少可以从文献中识别出“凯恩斯革命”的四层含义：理论、政策、方法论和知识社会学层面。流行的解释往往以理论革命为基点，将这四种含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如今熟知的“凯恩斯革命”的标准叙事。

首先，支持一场理论革命的理由在于，《通论》提出了一种其前提和结论与当时流行的古典经济思想截然不同的新经济学，不仅实现了与正统的古典经济学的彻底决裂，转移了经济分析的注意力，而且为政府管理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理论革命寻找证词大致沿着三条路径进行。其一，原子化地拆分凯恩斯的理论以挑选出最具革命性的成分。如今，我们对从《通论》中提取出来的形形色色的革命性要素并不陌生：有效需求理论、流动性偏好理论、不确定性和投资理论、非出清的劳动力市场理论。问题在于，那些认为凯恩斯理论具有革命性的经济学家赋予这些要素的权重非常不同，得到最多认证的是有效需求理论，它颠倒了古典理论中储蓄驱动投资的因果关系，并将国民收入/产出水平作为实现储蓄与意愿投资均衡的调节变量。<sup>⑥</sup>然后是非出清的劳动力市场与均衡的兼容性，即非充分就业均衡。其二，断

① 相关研究参见：Donald Winch, *Economics and Policy: A Historical Study*,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69, pp. 167-197; Ron Stanfield, “Kuhnian Scientific Revolutions and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8, no. 1, 1974, pp. 97-109; Ghanshyam Mehta,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vol. 6, no. 3, 1979, pp. 151-163; Mario Garcia, “Scientific Communities, Language and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Claudio Sardonì and Peter Kriesler, eds., *Keynes, Post-Keynesia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Essays in Honour of Geoffrey Harcourt, Vol. II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231-245; 赵雷：《研究范式视角的凯恩斯革命解读——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理论反思》，《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② Don Patinki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Stockholm School’,”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80, no. 2, 1978, pp. 135-143; Don Patinkin, *Anticipations of The General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on Keyn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p. 3-120.

③ Robert W. Clower, “Ohlin and the *General Theory*,” in Lars Jonung, ed., *The 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 Revisi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45-262.

④ Harry G. Johnson,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and the Monetarist Counter-Revolu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1, no. 2, 1971, pp. 1-14; Harry G. Johnson, “Keynes’s *General Theory*: Revolution or War of Independence?”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Revue canadienne d’Economie*, vol. 9, no. 4, 1976, pp. 580-594.

⑤ Roger E. Backhouse and Beatrice Cherrier, “The Age of the Applied Economist: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Since the 1970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49, supplement, 2017, pp. 1-33.

⑥ James Meade,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Milo Keynes, ed., *Essays on John Maynard Key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82-83.

言正是凯恩斯首次将上述所有革命性要素综合成一个新的分析体系，改变了经济分析的关注点和基本推理模式。<sup>①</sup>罗宾逊这样评价凯恩斯，“他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将这些材料组合在一起，并从中创造出本质上崭新的、更适合自己的时代的东西。他的突破不在于每一个细节，而在于一种全新的总体构想”。<sup>②</sup>其三，原教旨主义者更愿意使用“范式”来突出凯恩斯与古典理论在世界观和本体论方面的根本不同。<sup>③</sup>时间、预期和根本的不确定性在凯恩斯的理论图景中具有本体论上的优先性<sup>④</sup>，理论视域的这种格式塔转换最具革命性，反映在经济分析中就是一幅反均衡的货币生产型经济图景，或基于有效需求原理（而非有效需求理论）的生产范式。<sup>⑤</sup>这是经济学家观察与理解经济世界的方式的变革，表现在理论层面就是“从均衡观转向历史观，从理性选择原理转向推测或传统基础上的决策问题”。<sup>⑥</sup>所以，“凯恩斯革命”是一场范式转换的“科学革命”。

其次，支持一场政策革命的理由在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破除了自由放任的神话，成为政策制定的基本参照点，改变了主要国家的政策实践。为政策革命辩护的第一种方式是将其与经济理论的“凯恩斯革命”联系起来，只要理论革命成立，政策革命必然随之而来。这种辩护方式以经济理论为中心，假定凯恩斯的理论隐含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模型，从而将政策革命理解为政府内部人员“皈依”凯恩斯主义的观念革命。观念革命发生的证据在于，战时政府雇佣大量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试图推动政策转型。其中，英国1941年预算首次采用凯恩斯主义预算管理技术是迈出的关键一步，1944年5月英国政府的《就业政策白皮书》承诺战后继续以高水平 and 稳定的就业作为其主要政策目标则被视为政策彻底转变的标志。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利用预算调节总需求规模进而创造充分就业成为政府部门的常规政策。第二种辩护方式诉诸本体论层面的转变，辩护者们反复提请人们注意，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否符合凯恩斯的意图，经济政策框架显然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政府经济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出现重大变化。<sup>⑦</sup>虽然在具体行动方针和行动时间方面时有异见，但现在几乎都一致同意，政府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积极的行动以避免经济发生大幅波动，这种对政府权力和责任扩大后所能达到目标的整体看法的改变就是凯恩斯政策革命的本质。<sup>⑧</sup>这意味着，社会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稳定性的思考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对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态度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经济繁荣和衰退的影响，代表了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经济变革，并对经济政策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这使得罗宾逊把政策变革视作凯恩斯革命最伟大的内容。<sup>⑨</sup>故而，就像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的，经济史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在于，正是在政策领域，“凯恩斯革命”表现得最为明显。<sup>⑩</sup>

再次，支持—场方法论革命的理由在于，凯恩斯的推理模式改变了经济学研究的程序。从某种意

① Robert W. Dimand, “What Keynesian Revolution? A Reconsideration Seventy Years After the *General Theory*,” in Robert W. Dimand, et al., eds., *Keynes’s General Theory After Seventy Years*, pp. 301–305.

② Edward A. G. Robinson, “Could There Have Been a ‘*General Theory*’ Without Keynes?” in Robert Lekachman, ed., *Keynes’ General Theory: Reports of Three Decades*, New York and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64, p. 87.

③ Paul Davidson, “The Dual-Faceted Nature of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Money and Money Wages in Unemployment and Production Flow Prices,”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vol. 2, no. 3, 1980, pp. 291–307; Joan Robinson, *What are the Questions?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81, p. 56; Luigi L. Pasinetti, *Keynes and the Cambridge Keynesians: A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to be Accomplish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6–20.

④ 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88—91页。

⑤ Luigi L. Pasinetti, “J. M. Keynes’s ‘Revolution’——the Major Event of Twentieth-Century Economics?” in Luigi L. Pasinetti and Bertram Schefold, eds., *The Impact of Keynes on Economics in the 20th Centur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9, pp. 11–13.

⑥ Joan Robinson, “What Has Become of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Challenge*, vol. 16, no. 6, 1974, pp. 6–11.

⑦ Michael J. Oliver and Hugh Pemberton, “Learning and Change in 20th Century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vol. 17, no. 3, 2004, pp. 415–441.

⑧ G. K. Shaw, *Keynesian Economics: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88, pp. 22–23.

⑨ Edward A. G. Robinson, “Could There Have Been a ‘*General Theory*’ Without Keynes?” in Robert Lekachman, ed., *Keynes’ General Theory: Reports of Three Decades*, 1964, p. 92.

⑩ Luigi L. Pasinetti, *Keynes and the Cambridge Keynesians: A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to be Accomplished*, 2007, p. xiii.

义上说,方法论革命也从属于经济理论的“凯恩斯革命”,正如凯恩斯理论的革命性要素被识别为截然不同且相互冲突的部分,经济学家就凯恩斯的方法论革命也产生了分歧。一方面,当将“凯恩斯革命”置于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鼎盛期时,经济学家发现凯恩斯革命与数学革命、统计学革命和计量经济学革命并非相互独立<sup>①</sup>,它们共同促进了经济学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接受。<sup>②</sup>凯恩斯不仅用可操作性的术语定义了基本变量,而且尽可能将这些变量与实际数据相联系。基于此,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得以构建,从而为政府决策部门使用凯恩斯主义大型宏观计量经济预测模型提供了可用的框架。无疑,这场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方法论革命非常成功,它成为此后经济学进行经验分析的基准。另一方面,后凯恩斯主义者否定了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方法论革命,宣称凯恩斯在方法论层面的革命性贡献在于,将一种基本的过程分析法应用于货币经济,其中的决策和事件依一定时间顺序发生,而不同于所有事情都同时发生的新古典均衡方法。<sup>③</sup>后凯恩斯主义推崇的方法论革命始于对凯恩斯理论的本体论分析,其背后的哲学基础是开放系统,它反对形式主义数学方法,使用直觉和人类日常逻辑进行决策。<sup>④</sup>

最后,将革命视作一个社会过程,知识社会学层面的“凯恩斯革命”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改变了共同体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新的学术共同体。正如萨缪尔森描述的,《通论》征服了几乎所有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大多数3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都被《通论》迷住了,就像一种疾病首次侵袭……50岁以上的经济学家对这种疾病免疫力很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年龄介于二者之间的经济学家都开始出现感染,而且往往不知道或不承认自己的病情”。<sup>⑤</sup>正是这代年轻经济学家在二战后成为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改变了学术经济学的游戏规则。其二,通过标准化教育培养了规模庞大的后继者群体。这意味着经济学教育领域也发生了一场潜移默化的“凯恩斯革命”,这是一场用于教授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工具和模型的革命<sup>⑥</sup>,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写入教科书标志着革命的完成。<sup>⑦</sup>其三,形成了一个使用相同的语言进行交流的社会共同体。由于大多数人都是从正规教育中获得对新思想和新信息的理解,这就导致术语革命渗透到各个社会群体,塑造了一种共同的语言文化,这是约翰逊认为最能体现“凯恩斯革命”事实上已经发生的论据。<sup>⑧</sup>最后,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知识社会学事实是,凯恩斯造就了一个松散的反凯恩斯联盟。那些反对“凯恩斯革命”的人,为了树立新的权威,或回到旧的理论世界,也总是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解释“凯恩斯革命”,由此导致的“反革命”间接表明曾经发生过一场凯恩斯的理论革命。<sup>⑨</sup>而在政策领域,凯恩斯迫使秉持不同信仰的社会改革家为他们的立场辩护,因为他们日益认识到,存在着一种替代性的经济战略值得重视,这无疑消极地论证了政策革命的存在。

综上,“凯恩斯革命”成立的论据主要表现在理论、政策、方法论和知识社会学四个维度:理论上构建了一个取代古典理论的新经济学范式,为干预主义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这种思想渗透到政府部

① Don Patinkin, “Keynes and Econometric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croeconomic Revolutions of the Interwar Period,” *Econometrica*, vol. 44, no. 6, 1976, pp. 1091–1123.

② Ivo Maes and Erik Schokkaert, “On Positivism and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e en Management*, vol. 31, no. 1, 1986, pp. 81–91.

③ Victoria Chick, “The Nature of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A Reassessment,” *Australian Economic Papers*, vol. 17, no. 30, 1978, pp. 1–20.

④ Sheila C. Dow, “Preliminary Draft: Was there a (Methodological)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Robert W. Dimand, et al., eds., *Keynes' s General Theory After Seventy Years*, pp. 272–275.

⑤ Paul Samuelson, “Lord Keynes and the *General Theory*,” *Econometrica*, vol. 14, no. 3, 1946, pp. 187–200.

⑥ David Colander and Harry Landreth, “Political Influence on the Textbook Keynesian Revolution: God, Man, and Lorie Tarshis at Yale,” in O. F. Hamouda and B. B. Price, eds., *Keynesianism and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America: A Memorial Volume in Honour of Lorie Tarshi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8, pp. 59–72.

⑦ Mark Blaug, “Second Thoughts on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23, no. 2, 1991, pp. 171–192.

⑧ Harry G. Johnson,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and the Monetarist Counter-Revolu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1, no. 2, 1971, pp. 1–14.

⑨ Roger E. Backhouse and Bradley W. Bateman, “Whose Keynes?” in Robert W. Dimand, et al., eds., *Keynes' s General Theory After Seventy Years*, p. 8.

门，改变了政策制定的传统模式；它在方法论层面变革了经济学研究的程序，不仅形成了新的学术共同体，而且通过术语的普及和扩散，在学术界之外产生重大影响。最重要的是，无论就“凯恩斯革命”的性质和内容有多大分歧，这场革命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凯恩斯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代人的经济图景，重塑了社会理解经济问题的方式。<sup>①</sup>概言之，“凯恩斯革命”不仅是与过去的彻底决裂，而且创造了全新的观察世界的视角。

### 三、“凯恩斯革命”解构论

《通论》甫一问世，几乎立刻引发了致力于削弱凯恩斯革命性贡献的“反革命”浪潮。其矛头直接指向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在为“革命”论断辩护时编造的种种神话，不仅试图以严肃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消解凯恩斯的理论革命，而且力图还原“凯恩斯时代”政策制定的复杂过程，否定凯恩斯的政策革命。

理论层面的“反革命”主要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凯恩斯主义内部就如何解释凯恩斯的“新经济学”产生的根本分歧构成了第一条解构革命的路径。一方面，主流的凯恩斯主义者将理论视作用技术性语言表达的工具模型，他们在将《通论》中的思想翻译为数学模型的过程中，逐渐淡化了凯恩斯理论的革命性。这个过程始于希克斯1937年的著名文章，在他的解释中，凯恩斯的经济学根本不具有革命性，只是在现有的新古典工具包中增加了“萧条经济学”。希克斯开发的IS-LM模型表明，古典理论与凯恩斯理论是同一分析框架中的两个不同特例，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变量和曲线斜率。甚至在某种非均衡解释中，被纳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的凯恩斯经济学反而成了古典理论的特例，非充分就业均衡也变成由于各种因素而阻碍调整的非均衡过程中的暂时均衡解。另一方面，对那些坚持认为凯恩斯理论蕴含革命火种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主流凯恩斯主义对《通论》的解读完全曲解了凯恩斯的本意，《通论》被嫁接到一个与凯恩斯的图景完全相悖的分析框架中，以至于凯恩斯想要实现的理论革命从一开始便被扼杀在萌芽中。<sup>②</sup>特别是，主流宏观经济学以更复杂的形式重新引入了凯恩斯曾拒绝的公理，实物分析重新得到肯定。<sup>③</sup>凯恩斯的经济学重新融入经济学主流意味着“凯恩斯革命”几乎失去了全部意义，革命仍有待完成。<sup>④</sup>这也意味着，后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凯恩斯方法论革命从未发生。<sup>⑤</sup>与后凯恩斯主义“革命火种”的观点相似，另一种否定革命的方式认为，凯恩斯想要实现的革命在当时由于缺乏技术工具而被迫“改道”<sup>⑥</sup>，结果仅仅是一场复杂内核并不成熟的只发生在表层的理论革命，只有当引入能够解决总量均衡的多重性问题的数学工具时，这场革命才有可能转入深层结构。<sup>⑦</sup>

第二条消解理论革命的路径包含三个相互联系但侧重点不同的论点，主要沿着受到攻击的老一辈古典经济学家反驳凯恩斯的论点继续深入，形成了系统的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史研究。首先，消解了存在单一的古典正统理论的神话，指出凯恩斯故意以夸张的“革命”修辞虚构了一个本不存在的古典教

① Bernard Corry, “Keynes’ s Economics: A Revolution in Economic Theory or in Economic Policy?” in Robert D. Collison Black, ed., *Ideas in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86, pp. 230–232.

② Luigi L. Pasinetti, “Comment,” in David Worswick and James Trevithick, eds., *Keynes and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07; Paul Davidson, “Reviving Keynes’ s Revolution,” in David L. Prychitko, ed., *Why Economists Disagre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lternative Schools of Thought*,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pp. 67–68.

③ Colin Rogers, “Keynes, Keynesians and Contemporary 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An Assessment,” Research Paper NO. 2008–05,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School of Economics; Colin Rogers, “The Principle of Effective Demand: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General Theory*,” in Robert W. Dimand, et al., eds., *Keynes’ s General Theory After Seventy Years*, pp. 152–153.

④ Will Hutton, *The Revolution That Never Was: An Assessment of Keynesian Economics*, London: Vintage, 2001, p. xviii.

⑤ Sheila Dow, “Preliminary Draft: Was there a (Methodological)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Robert W. Dimand, et al., eds., *Keynes’ s General Theory After Seventy Years*, pp. 282–284.

⑥ 米歇尔·德弗洛埃：《宏观经济学史：从凯恩斯到卢卡斯及其后》，房誉、李雨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页。

⑦ David Colander and Harry Landreth, “Introduction,” in David Colander and Harry Landreth, eds., *The Coming of Keynesianism to America: Conversations with the Founders of Keynesian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6, pp. 13–14.



条，无故挑起争端。具体来说，凯恩斯提出了一个自己版本的经济思想史来为其想要发动的经济学革命辩护，他在理论层面虚构了一个“古典经济学”稻草人，在“目前尚不存在正统思想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思想”<sup>①</sup>，以此极力宣扬《通论》之前存在一种受单一理论信条支配的正统观念。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凯恩斯随意歪曲、严重误读了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如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其关于货币和经济周期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中已经完全抛弃了“萨伊定律”，但凯恩斯却错误地断言，“萨伊定律”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主导着忽视有效需求概念的正统经济学。<sup>②</sup>庇古也表示，只有接受早期的经济学家忽视了货币的作用，甚至默认不存在就业波动的神话时，用“革命”来形容凯恩斯的成就才是恰当的。<sup>③</sup>相反，20世纪前三十年的经济学表现为相互竞争的思想流派，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影响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奥地利学派与斯德哥尔摩学派，美国经济学则呈现出多元主义。而广义上的古典—新古典学派几乎同时容纳了各种异端和主流观点<sup>④</sup>，当时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正统思想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其次，在其“虚构”古典教条的基础上，经济学家进一步指出凯恩斯的“新”理论实质上深深地根植于他所驳斥的“旧”经济学。这种论点反驳了“凯恩斯革命”是全新的原创的神话，它源于一种对“革命”或“革命性”的特殊理解，将“革命性”等同于“独创性”或“原创性”。由此，“革命”就意味着首次陈述或独立发现某种事物。于是，“凯恩斯革命”不成立的原因就在于，《通论》中所有能够被视为革命性的要素在此前均已存在，凯恩斯充其量只是将已有元素捏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完美的体系。就理论层面的“凯恩斯革命”而言，那些曾被视作革命性的成分均已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更久远）的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文献中反复出现过，“凯恩斯革命”显然涉及制造神话的因素，它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革命，也绝非凯恩斯的独创。<sup>⑤</sup>有效需求原理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和霍布森（John Hobson），凯恩斯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在这方面也颇有建树，乘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卡恩（Richard Kahn），流动性偏好理论早已由莱文顿（Frederick Lavinton）研究过，霍特里（Ralph Hawtrey）则预见到了凯恩斯关于刚性价格对总需求产生影响的思想。布兰查德因此断言，宏观经济学所有正确的要素均在《通论》之前便已形成，《通论》只是在方法论上通过三个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整合了这些早已存在的模型要素。<sup>⑥</sup>特别是，斯德哥尔摩学派对“凯恩斯革命”持严重怀疑态度，缪尔达尔评论道，“凯恩斯的《通论》在我们看来，是在我们熟悉的（维克塞尔）思路写出的杰出而重要的著作，并没有像在他自己的国家和其他地方引起震惊和思想革命的感觉”。<sup>⑦</sup>俄林也认为，“凯恩斯试图对经济理论进行协调，但至少从斯德哥尔摩学派的视角来看，他似乎不够激进或富有革命性”，放弃过程分析的动态方法，转而使用静态均衡框架，保留了边际生产力、劳动供给的效用分析等均表明，凯恩斯的方法过于保守。<sup>⑧</sup>希克斯甚至声称，凯恩斯的理论是一种倒退，“他向马歇尔正统理论又迈回了一大步，他的理论变得难以与经过修正和限定的马歇尔理论区分

① David Laidler, *Fabricating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Studies of the Inter-war Literature on Money, the Cycle, and Unemployment*, p. 4.

② Gottfried von Haberler, "The General Theory after Ten Years," in Robert Lekachman, ed., *Keynes' General Theory: Reports of Three Decades*, London: Macmillan, 1964, pp. 283-284.

③ A. C. Pigou, "Mr. J. M. Keynes'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Economica*, vol. 3, no. 10, 1936, pp. 115-132.

④ Jürg Niehans, "Classical Monetary Theory, New and Old,"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19, no. 4, 1987, pp. 409-424.

⑤ David Laidler, *Fabricating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Studies of the Inter-war Literature on Money, the Cycle, and Unemployment*, 1999, pp. 3-4.

⑥ Olivier Blanchard, "What Do We Know about Macroeconomics that Fisher and Wicksell Did No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5, no. 4, 2000, pp. 1375-1409.

⑦ Gunnar Myrdal, *Value in Social Theory: A Selection of Essays on Methodology*, in Paul Streeten ed.,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 1958, pp. 240-241. 另见冈纳·米尔达尔：《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陈羽纶、许约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8页。

⑧ Bertil Ohlin, "Appendix III: Some Notes on the Stockholm Theory of Saving and Investment III (1937),"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3, no. 2, 1981, pp. 239-255.

开来”。<sup>①</sup>总之，凯恩斯并非创造了全新的理论，而是高度选择性地重组了此前一直贯穿于这门学科的主题，并赋予旧概念以新的术语。最终，重组的结果是IS-LM模型，围绕这个新的形式模型（无论它多么背离凯恩斯的真实含义），真正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目前习以为常的现代宏观经济学。<sup>②</sup>

最后，凯恩斯的新经济学绝非与过去的彻底决裂，“革命”之说也就毫无根据。这意味着历史的演进大体上是连续的，不会出现突然的断裂。将此论点继续推进，就得出了一个极端的论断，即否认在真正的经济科学层面会发生重大革命。秉承这种历史演化观的经济学家基本上持一种经济知识的“累积性观点”，强调现在与过去的连续性。<sup>③</sup>早期的汉森将《通论》解释为“（凯恩斯）数年来所追求的思想路线的自然演变……从为‘新经济学’奠定基础的意义讲，这本书并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sup>④</sup>；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视经济理论的发展为一个以连续性的进化而非革命为特征的过程，他批评凯恩斯对前人过于苛刻，并力图在旧形式与新思想之间进行调和。<sup>⑤</sup>奈特敦促经济学家“‘忘记’经济理论的革命”，并将《通论》视为对当时经济周期文献的一个贡献<sup>⑥</sup>；哈伯勒承认凯恩斯的伟大和独创性，但坚持经济学中“知识的积累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带来一场真正的革命”。<sup>⑦</sup>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观的一个变体，即哈罗德和希克斯所说的重点的重新调整或注意力的转移，这种调整可能构成一场概念层面上的革命，但“凯恩斯并没有实现基本经济理论的革命……对一个体系进行重新调整，尽管在术语上存在分歧，但这个体系的大体轮廓已经得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的认可”。<sup>⑧</sup>秉承这种“渐进主义”的历史发展观的结果是，凯恩斯只是继承了古典—新古典传统，用新的术语重新解释旧的问题。正如卢卡斯所言，“经济学思想的所有进步，在经济理论的基本核心方面的发展，完全是学习如何研究休谟、斯密和李嘉图想研究的事物，只是研究得更好……因此，我不认为在科学意义上，在新范式意义或经济理论向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的意义上，曾有过凯恩斯革命”。<sup>⑨</sup>

相较而言，从政策层面解构“凯恩斯革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争论的焦点在于，确实发生的政策观念转变的性质和时间，以及这种转变与凯恩斯理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破除了“荒野中孤独呐喊”的凯恩斯形象。对凯恩斯同时代及之前的政策思想的考察表明，凯恩斯主义政策（无论其确切内涵为何）并非《通论》之后才被用作管理经济的手段，并不需要一场凯恩斯的政策革命来为此作保。早在《通论》问世之前，“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凯恩斯同时代的不同国家的经济学家就与凯恩斯持大致相同的政策观点，如庇古明确支持公共工程。哈奇森甚至更进一步地指出，“财政部向‘凯恩斯主义’思想转变的决定性阶段是在《通论》出版前一年”。<sup>⑩</sup>戴维斯用一整本书论证了大萧条期间，美国经济学家

① J. R. Hicks, "Mr. Keynes and the 'Classics': 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Econometrica*, vol. 5, no. 2, 1937, pp. 147-159.

② David Laidler, *Fabricating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Studies of the Inter-war Literature on Money, the Cycle, and Unemployment*, pp. 3-4.

③ Jürg Niehans, "Revolution and Evolution in Economic Theory," *The Australian Quarterly*, vol. 65, no. 1, 1993, pp. 498-515.

④ Alvin H. Hansen, "Mr. Keynes on Underemployment Equilibriu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44, no. 5, 1936, pp. 667-686.

⑤ Gordon Fletcher,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and its Critics: Issues of Theory and Policy for the Monetary Production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1989, pp. 37-39. 庇古与罗伯逊的看法相似，他虽然认为《通论》是凯恩斯为经济分析的武器库增添的新颖且有价值的内容，但断言经济学的进步不是通过洗刷历史，而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因此，庇古敦促经济学家们以爱因斯坦为榜样，不要沉迷于贬低过往巨匠的成就，参见 A. C. Pigou, "Mr. J. M. Keynes'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⑥ Frank H. Knight, "Unemployment: And Mr. Keynes' s Revolution in Economic Theory,"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 Revue canadienne d' Economie et de Science politique*, vol. 3, no. 1, 1937, pp. 100-123.

⑦ Gottfried von Haberler, "Sixteen Years Later," in Robert Lekachman ed., *Keynes' General Theory: Reports of Three Decades*, pp. 295-296.

⑧ Roy F. Harrod, "Mr. Keynes and the Traditional Theory," *Econometrica*, vol. 5, no. 1, 1937, pp. 74-86.

⑨ Robert E. Lucas Jr, "Keynote Address to the 2003 HOPE Conference: My Keynesian Educatio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6, no. 5, 2004, pp. 12-24.

⑩ Terence W. Hutchison, *On Revolutions and Progress in Economic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94.

(特别是芝加哥学派)始终秉持着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观点。<sup>①</sup>不仅如此,许多国家在《通论》之前就已经独立地实践了如今属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即“原始凯恩斯主义”(proto-Keynesianism)。纳粹德国的赤字支出受到重整军备的激励,美国国家政策长期重视总需求,并深受实用主义传统的影响,罗斯福“新政”更多源自秉持该传统的制度主义。因此,20世纪30年代的“新”经济学并没有带来新的政策立场,凯恩斯主义政策并没有特殊的新颖性,也绝非凯恩斯本人独自坚守的立场。

另一方面,“修正主义”经济史家致力于削弱政策制定中的理论成分,淡化20世纪30年代财政部对凯恩斯观点的让步,消解政策革命的理论根源。在经济理论家构建的“凯恩斯革命”叙事中,政策被视为理论的衍生品,这导致政策革命被理解为政府内部(特别是财政部)“皈依”凯恩斯经济学的必然结果。这种关于经济政策制定的“理性主义”概念是难以置信的,它不仅夸大了经济理论的作用,高估了政府工作人员的经济学素养,而且低估了政策制定的复杂性。<sup>②</sup>为此,“修正主义”经济史家深入考察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各国的经济政策实践,从三个层面解构了凯恩斯政策革命的种种神话。

第一,解构了大萧条期间存在单一的政策教条以及当时凯恩斯的政策声音不受重视的神话。“修正主义”经济史家指出,财政部的政策立场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灵活多样,将“大萧条”期间政策立场简化为教条的“财政部观点”,并把财政部官员描绘成顽固的守旧派是一种“虚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财政部与凯恩斯就重整军备而举债的必要性以及公共工程在促进经济复兴当中的作用进行了充分交流,甚至在货币政策领域,凯恩斯与政策制定者之间保持了一致。<sup>③</sup>但政策制定是一个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权衡考量的过程,受到制度的、行政的约束,财政部因之保持了高度的敏感性,从而限制了其实际实施政策的能力。特别是,凯恩斯关于应对失业的公共工程计划并非因政府坚持“财政部观点”而失败,之所以未被采用,更多的是因为当局出于行政管理方面(尤其是道路建设计划)的考虑。<sup>④</sup>

第二,淡化了战争期间政策话语的凯恩斯主义性质和财政部“皈依”凯恩斯主义的程度。一方面,英国1941年预算和1944年《就业政策白皮书》被视为政策向凯恩斯主义转变的关键标志。然而,前者可能只代表了防止通货膨胀和限制国债所需的措施,并非向凯恩斯主义的转变,且没有得到财政部官员的普遍认可。至于后者,尽管其凯恩斯主义成分更为明显,可被视为凯恩斯主义政策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但远非政策革命胜利的标志,它更像是多方博弈之下妥协的产物,是为了迎合人民日益激进的情绪而签订的契约或权宜之计。<sup>⑤</sup>另一方面,在评估政府官员对“新”经济学的接受程度时,“修正主义”经济史家普遍怀疑财政部高层的经济素养。即便布斯谨慎地将凯恩斯政策革命发生的时间推迟至1947年,当时财政部在和平时期有意引入预算盈余以控制通货膨胀<sup>⑥</sup>,但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表明,财政部官员秉持的经济观念在1947年发生了任何重大变化。<sup>⑦</sup>

第三,为战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凯恩斯主义的解释。“修正主义”经济史家虽然承认各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转变,但这种转变的性质远没有凯恩斯革命的支持者所认为的深刻和彻底。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理论或意识形态视野之外的条件,如脱离金本位制、公共开支的足够增长以及使用国民核算体系。因此,凯恩斯的政策革命充其量只是解释战后各国经济奇迹的其中一个因素。<sup>⑧</sup>更重要的是,当接受利用预算赤字解决失业问题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理念时,“修正主义”经济史家找不到能够将财政部向凯恩斯主义的转变描述为任何意义上的“革命”

① J. Ronnie Davis, *The New Economics and the Old Economists*, Ames: The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64-106.

② Neil Rollings,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Policy-Making: A Commen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8, no. 1, 1985, pp. 95-100.

③ Peter Barberis,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Whitehall: A Study in Public Policy,”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vol. 3, no. 3, 1988, pp. 11-23.

④ Jim Tomlinson, “Why Was There Never a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Economic Policy.”

⑤ Jim Tomlinson, *Problems of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1870-1945*, London: Methuen, 1981, pp. 132-133.

⑥ Alan Booth,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Economic Policy-Making.”

⑦ Neil Rollings, “British Budgetary Policy 1945-1954: A ‘Keynesian Revolution’?”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1, no. 2, 1988, pp. 283-298.

⑧ Jim Tomlinson, “A ‘Keynesian Revolution’ in Economic Policy-Making?”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7, no. 2, 1984, pp. 258-262.

的证据。事实上，这一时期相对较好的就业和增长记录并不依赖于预算赤字。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预算保持经常账户盈余状态，相关的统计检验表明，在1948—1974年这一所谓的“凯恩斯时代”，经济活动水平与按周期调整的预算状况之间并无显著相关性。这期间的财政政策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预算赤字的趋势水平遵循更古老的“财政部观点”，强调政府债务相对于国民收入和公共部门资本资产规模的可持续性，而政策决定的赤字在这一趋势水平附近的变化主要是受国际收支而非逆周期调节的影响。<sup>①</sup>政策制定这种复杂性表明，政策向凯恩斯主义的转变绝非彻底和突然。由于各种“背景噪音”的干扰，政策制定过程必然是对一系列不同压力的试探性回应，不会发生突然的单向转变。财政部思维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到战后时期一直保持着强大的连续性，尽管政策框架向凯恩斯主义的转变在20世纪40年代基本完成，但是这一过程非常漫长，且反复无常。政策变化的这种渐进本质，使得“革命”这一术语本身并不适合用来描述政策变化，甚至导致汤姆林森（Jim Tomlinson）和康登（Tim Congdon）等经济史家得出（英国）政策领域从未发生“凯恩斯革命”的极端论断。

综上，在理论和政策层面解构“凯恩斯革命”有赖于严肃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研究，其中最关键的论点在于，破除“革命”是全新的从而是与过去彻底决裂的神话。基于此，经济学家们不仅重新发现了可被视为凯恩斯理论和政策的“先驱”，而且特别突出了经济学史的连续性和政策演变的渐进性。因而，“凯恩斯革命”最好被视作“制造”的神话。

#### 四、总结与反思

“凯恩斯革命”是20世纪经济学中最伟大的事件。现如今，经济学文献和教科书通常使用“凯恩斯革命”这一术语来描述凯恩斯的《通论》对经济学产生的重大影响。这种惯常的用法虽然隐含着凯恩斯为经济学带来革命的承诺或信仰，但该术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退化成为一种修辞，而非出于对真实历史事件的考量。本文的论争史回顾表明，从一开始，“凯恩斯革命”就充满挑衅、论战和英雄主义，其含义远未清晰明了，“革命”的性质仍有待进一步澄清。论争主要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之前，基调基本是乐观主义的。这是一段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谬误走向真理的故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取代古典理论成为经济学新正统，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各国政府部门成为共识，IS-LM模型成为经济系学生们必须学习的基准模型，“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最能表达革命胜利的喜悦。然而，“修正主义”经济史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爆发，开启了30年的解构“凯恩斯革命”神话的荆途，严肃的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研究淡化了凯恩斯在理论和政策层面的革命色彩。回过头来看，这场关于经济学是否发生过“凯恩斯革命”的论争还剩下什么？我们从中又能得到什么？

首先，20世纪后半叶的总体趋势肯定是消解凯恩斯革命，特别是“修正主义”经济史家在气势上占据上风，反修正主义的回应要么是重复以前的论调，要么是以一种消极的姿态进行防守。然而，这不代表这种修正削弱了凯恩斯的影响力，“修正主义”经济史家未能成功地塑造一个新的凯恩斯形象。可以预期的是，对凯恩斯及其《通论》的解释将继续存在分歧，这是导致经济学家就“凯恩斯革命”的性质形成大相径庭的看法之根源所在。庇古曾抱怨凯恩斯太愿意高举思想革命的旗帜，强调分歧大于共识，“用不常见的含义来定义常见的词汇……给那些思维不如他敏捷的人造成了很多困惑”。<sup>②</sup>事到如今，重要的可能已经不是如何解读《通论》，而是要认识到一个既定的事实，即“凯恩斯革命”这一术语已经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这也是那些“反革命者”和反凯恩斯主义者仍然不得不坚持使用该术语的原因：反对权威必须首先承认或创造权威。罗宾斯在1959年的评论仍然适用，“虽然我并不认为凯恩斯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具有独创性或绝对正确，但我不反对把他的影响描述为凯恩斯革命……我认为，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凯恩斯革命的发生，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策上，

<sup>①</sup> Tim Congdon, “Did Britain Have a Keynesian Revolution? Fiscal Policy since 1941,” in John Maloney, ed., *Debt and Deficits: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8, pp. 90–92.

<sup>②</sup> 转引自 Elizabeth S. Johnson, “Keynes as a Literary Craftsman,” in Elizabeth S. Johnson and Harry G. Johnson, *The Shadow of Keynes: Understanding Keynes, Cambridge and Keynesian Econom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 37.

事情都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sup>①</sup>

其次，引发最多争议的是“凯恩斯革命”这一术语的语义问题。其一，一些经济史家在撰写有关“凯恩斯革命”的解释史时，关注的是“凯恩斯”，而非“革命”，实际上呈现的是对“凯恩斯进行解读”的历史，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这种术语的泛化使用淡化了对“革命”的关注，这就导致将新凯恩斯主义者、新新古典综合学派（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甚至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纳入其历史叙述。其二，当经济学家使用这一术语时，他们想表达的是“凯恩斯的革命”，还是“凯恩斯主义的革命”，抑或兼而有之？特别是在“修正主义”经济史文献中，如何定义“凯恩斯革命”是导致缺乏共识的核心根源。诚然，“革命”是一项集体事业，但区分革命发起者与追随者的贡献显然有助于澄清革命的本质，很多革命神话往来自追随者的编造。譬如，传统的“凯恩斯革命”叙事将凯恩斯塑造为先知形象，但凯恩斯本人多次承认，其与当时主要的经济学家的政策立场并无二致。又如，按照后凯恩斯主义的看法，凯恩斯本人想要发动的革命从一开始便夭折了，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其实是冒牌的“凯恩斯革命”或“冒牌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在这种意义上，莱德勒称真正的革命是IS-LM形式模型的综合，以及柯南德认为凯恩斯的政策革命不如说是“勒纳的政策革命”，也就不无道理了。更改术语使用习惯为时已晚，但这并不是随意混乱使用术语的理由，这里也并非鼓励玩弄一种语义游戏。

再次，对“经济学是否存在一场凯恩斯革命”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判别经济学革命的标准或框架。在这方面，尽管经济学家通常借用库恩的“科学革命”和“范式”来理解该问题，却忽视了库恩关于“革命”作为一种社会过程或共同体努力的启发性见解。事实上，“革命”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特性：其一，革命是观念或世界观的转变；其二，革命是集体事业，而非英雄主义式拓荒。因此，一个经济学革命的分析框架必须同时具备理论图景和知识社会学两个维度。革命性理论只有传播成为共同体的公共品，改变了共同体的行为模式，才有可能被视作“革命”。革命成果成功扩散的一个重要知识社会学表现是，该成果写入入门教科书，成为在该领域学习的学生的必修课。诚然，教科书传统倾向于掩盖革命的痕迹，将理论的演进写成连续的故事，但它在开启一个新的巩固革命成果的常规科学研究阶段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知识社会学表现是，学术共同体结构在革命期间的演变，这包括经济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其代际结构、制度规范和奖惩机制等的演变。就目前学界缺失理解经济学革命的合意框架而言，关于“凯恩斯革命”的论争远未终结。

最后，“凯恩斯革命”的论争史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其中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否需要一场中国经济学的“革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合意的经济学“革命”分析框架。一方面，无论如何定性“凯恩斯革命”，不可否认的是，“革命”兼具断裂和连续两方面属性。这意味着，新知识的生产总是伴随着创造与传承。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立足于中国实践，创造新的理论框架，而且应当继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并合理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凯恩斯构建其新经济学的关键做法在于，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实现了“术语革命”。任何一种知识体系总是表现为一种逻辑化的概念系统，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出发点。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术语革命”引领变革的旗帜，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谈论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亟须以本土情境为依托，以理论思维为引导，提炼出能够用来引领本土经济学发展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打破以西方经济学思维和术语理解和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藩篱。

（责任编辑：冉利军）

<sup>①</sup> 转引自 Susan W. Howson, “Lionel Robbins,” in Robert Dimand and Harald Hagemann, eds., *The Elgar Companion to John Maynard Keyn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9, p. 336.